

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

东汉副词系统研究

DONGHAN FUCI XITONG YANJIU

葛佳才 著

岳麓书社

东汉副词

葛佳才 著

系统研究

DONGHAN FUCI XITONG YANJIU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副词系统研究/葛佳才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5

ISBN 7—80665—580—8

I. 东… II. 葛… III. 汉语—副词—研究—东汉
时代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014 号

东汉副词系统研究

作 者:葛佳才

责任编辑:蒋 浩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94 千字

印数:1—3,000

ISBN7—80665—580—8/G·435

定价:25.00 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地址:湖南省宁乡县宁株路中小企业发展园

邮编:410600

电话:0731—780137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序：告予以有年

鲁国尧

四十多年前，我开始研究宋词韵，除了读宋词外，也读了若干有关宋代的书。十五年前我在日本发现了宋人卢宗迈的《切韵法》，这是宇内孤本，为了考证作者的生平仕履、揭明书中的内蕴，我更读了许多宋人文集、笔记、史书。书读得多了些，就形成一种印象：跟西、东汉不同，北、南宋是连贯的，长达三百二十年，然而它的特点是，几乎与内忧外患相始终。我敢说，宋代史就是一部动乱史，其中最纷繁复杂的一段便是从王安石变法到“靖康耻”这五十年，各种人物交错穿梭，反复纷纭，而“雷州”也于此时成了一个瞩目的舞台。北宋后期最著名的大案即元祐党人案，其中的重要人物如苏轼、苏辙、秦观，都跟这个僻远军州发生关系，而苏辙、秦观更是在雷州被“编管”了近三年。我们只要翻看《栾城集》、《淮海集》，读他们在雷州写的诗赋，例如《自作挽词》、《雷阳书事》、《海康书事》、《次韵子瞻过海》等，便感到满纸浸透了荒凉、凄楚、悲哀、颓丧，在他们的笔下，“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苍茫飓风发，怒号兼昼夜，山海为颠蹶”。

然而岁月更迭，星移斗转，昔日蛮荒域，今为繁华地。尤其是在近年国运中兴之时，“旧貌换新颜”！如今的雷州，堪称民庶

物丰，尤可称道的是，现代化的湛江市湛江港，崛起在祖国的南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谓予不信，请看这部丛书。

湛江的高等学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将朱城、方平权、张令吾、张应斌、陈云龙、马显彬、葛佳才等七位语言学者的专著或论文集集束出版，名之曰“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这几位学者，我们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在中国的著名语言学杂志《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上会经常见到他们的大名、大文。他们富于春秋、前程远大，他们将会为中国语言学事业作出更重要的贡献，这我坚信。

为什么？且让我拈出“规模效应”、“综合实力”、“团队精神”三个四音节词组来阐释我自己的这一看法。我读大学生时，受到“关心国家大事”的教育，于是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至今依然，时间长了，就学会了上面这几个“新词”，学以致用如下。

显然，在我们案头的这七位学者的七本书，都是他们的心血结晶、精心之作。这七本书是各自的著作，然而这七本书却不是各别的，如今摞成厚厚一叠，成了丛书，其意义就很不一样。当这堆书映入我的眼帘时，视觉反应传递到我的大脑里，首先迸出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湛江师院的语言学科的力量相当强！”天下之理：成品成了规模，就必然具有了规模效应，因此湛江师院的语言学科不仅使我，也会使整个语言学界瞩目。请看，就语言的各个分支学科而言，这套丛书的研究领域，遍及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语法。如果再换个视角，在这套丛书里，既有语言的本体研究，又有语言的应用研究；既有通语的研究，又有方言的研究；既有古代汉语的研究，又有现代汉语的研究。可以说，这套丛书使中国语言学界检阅了湛江师院的语言学队伍，体认了湛江师院语言学科的综合实力。我还从这套丛书中感悟到湛江师院

语言学科的团队精神。人是有理智的生物，老话叫做“万物之灵”，人需要精神的主导。在社会活动中，一个学术群体能否取得成功，就需要学科带头人和成员同仁共同发扬团队精神。从这套“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可以看出，这个语言学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很好地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将自己经年累月的研究心得勒成专著，同时彼此协作，出版了这套丛书，他们的总和不再是7，而至少是10。

1100年初，苏辙、秦观都还在雷州过着愁苦的生活，苏轼也还在儋州，“天赐黎山活逐臣”（杨万里诗句），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写下了悲怆的一页。905年后的今天，在同样的土地上，却是“肩摩踵接”，“车如流水”，众多的语言学者活跃在南疆，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而贡献出他们的优异成果，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欣慰，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

秦观当年在放逐之地写了篇《和〈归去来辞〉》，他向往北归回到他的故乡——高邮，文中有两句话：“乡人告予以有年，黍稷郁乎盈畴。”我借用来，改个字：南粤“学人告予以有年”。《说文解字》曰：“年，谷孰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年。’”年，在甲金文中，从禾，人声，反正都从禾，在农业社会里，禾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甲骨刻辞中“有年”、“大有年”是常见词语。这套“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就是南粤语言学者“有年”的标志。我相信，不数年后，南粤语言学园地的“大有年”的捷报会北传，传遍祖国大地。

2005年4月19日于江左

序

葛佳才的博士论文《东汉副词系统研究》即将出版，我为他感到高兴。佳才要我在书前面写几句话，这也是人之常情。重读佳才的论文，不禁又回到了一年前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

葛佳才是2000年暑假从四川大学毕业考入我校就读博士研究生的，由方一新和我共同指导。刚见面的时候，只见他身材瘦削，戴着眼镜，说话腼腆，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后来的学习也愈发显示了江南才子的特色。佳才原是俞理明先生的高足，从事汉语史研究多年，喜欢从系统的角度探讨汉语词类的发展，所以到我办公室谈起论文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词汇系统……”。一年后，要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了，佳才决定要做东汉副词研究。副词是介于实词、虚词之间的一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数量大、变化多，几乎都是从实词发展而来的。如何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副词，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了解并支持佳才的想法，希望他能以此作为突破口，通过副词探讨汉语的词汇系统。

佳才的确才思敏捷，写文动辄洋洋洒洒。2003年三四月间，正是“SARS”在粤、京等地横行的日子，佳才交来了厚厚的一摞初稿。看过后，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佳才忍痛割爱去改。几经反复，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佳才此书有这样几个

特点:

在指导思想上,牢牢地把握住了“词汇是一个系统”的理念。作者指出:“我们在一个个地考释词语、描写各个时期词汇面貌的同时,也需要在系统观的指导下,积极探讨某些词群(或语义场)的历史变化,并有意识地寻找词汇发展变化的特点、规律和机制。”本书在概述了东汉副词面貌的基础上,选取9组典型副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描写、条分缕析了它们的发展变化,互相之间的联系、互动,使读者对东汉副词特别是一些常用副词、用于否定词前的极量副词、疑问句中的语气副词三类词的概貌、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在研究方法上,从语义、功能的相关性出发,经过系联,选择9组副词作为研究对象。我曾经在评江蓝生、曹广顺两位先生的《唐五代语言词典》的文章中说:“(汉语词汇史研究)不能对词语只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而要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是构词规律。”佳才比我高明,他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佳才认为,这也就是他这本书对东汉副词加以系统研究的基本思路 and 具体方法。该书采用了“异中求同”的比较、综合的研究方法。表现为:1. 不同组群的构成,以其在东汉共时平面中意义、用法的相同为纽带,并从历时的角度追溯其个体成员的意义和用法,把共时描写和历时考察结合起来。2. 组群中的个体尽管在来源和功能、使用频率、位序和搭配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虚化起点和演变过程、引申方式和虚化机制上表现出一致性,需要采用比较加综合的研究方法。3.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对一些词和义的异同、变化加以解释,注意描写和解释的结合。

佳才此书,勾勒了东汉副词的基本面貌,重点描写了9组副

词的发展演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描述了东汉副词的基本情况，勾勒了从先秦以来的发展概貌。作者以《论衡》、《风俗通义》和汉译佛经为基本语料，考察东汉单音副词 421 个，副词义 798 项；双音副词 565 个，副词义 602 项；三、四音节副词 61 个。并以图表的形式说明在这些副词中，旧词和新词、旧义和新义的比例，直观地介绍了东汉副词的新发展。作者认为：东汉是汉语副词发展的重要时期，单音节副词出现了较多新词新义，副词复音化已处于迅速发展的前期，复音副词不但初步形成了系统，构词方式也有了长足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汉语副词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总体走向。

二是抉发了一批新生副词，考察了它们的虚化过程。东汉是汉语词汇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汉译佛经的产生、道教的兴起和道教文献的传播、汉乐府的产生，都为词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二三”本盖为实指二次三次，后语义虚化，泛指多次，就产生了“屡次、再三”义，演变为副词。“二三”的这一用法已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卷二）。

作者也常常考察副词由实而虚的过程。如：“伤”由其本义“创伤”引申为程度副词“太、过于”，中间经过了动词“嫌、失于”的阶段，《潜夫论·忠贵》：“婴儿常病，伤饱也；贵臣常祸，伤宠也。”“伤”都是“嫌、失于”义，动词。有人把它们解释为副词，不确。

在对所掌握的语料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敢于提出自己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修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结论。如，关于三音节的复合词，潘允中、史存直两位先生认为系近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徐浩认为到宋代仍未产生纯语法的三音节复合词。作者经过统计，发现在东汉复音副词中，三、四音节的有 61 个，其构成

形式有二加一、一加二、三字分、嵌入等方式。

三是把语义、功能相关的副词系联在一起，一组一组地进行比较研究，正其渊源，明其流变。这是比较突出的优点，即通过“整体观照”的方法，理清以往研究中的分歧之处，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东汉译经中，“适”可放在否定词前面，构成“适无”一词。有学者认为“适无”表示“均无、都无”，“适”用法略等于否定词前面的“了”；也有学者认为“适无”的“适”是“应当”义。作者认为，东汉以来，在否定词前面表示彻底否定语气的副词不少，已经构成了一个系统。把“适”放进这一系统中考察就可以发现，“适”与系统中其他成员一样，是在否定词前强调彻底否定的语气副词。这一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改变了以往对副词等虚词的零散的、个别的研究，尝试把它们纳入到整个词汇（副词）系统中加以观照，因而其研究视野较宽阔，分析考虑的角度也相对周全，研究结论显得平允、全面，有不少地方补正、充实了以往的研究，为汉语副词研究作出了贡献。

当然，本书在语料运用、副词选择以及具体的考证溯源方面，都还有可议之处；行文也略显拖沓，有些考证也未必需要，凡此都是本书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作者扎实的考据功夫和系统的理论素养使本书成为了一部有分量的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专著。我为佳才的进步感到由衷高兴，也期待他有更多的高水平成果问世。

王云路

2004年12月16日

绪 论

本书试图在对东汉副词概况有了一个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系统思想为指导，选取较典型的几组副词加以尝试性的综合比较研究。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词汇系统及其性质、相应的研究现状、考察角度等作一个大致的介绍和总结，附带提及选题的意义、研究的材料、方法和内容。

一、词汇是一个系统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语法的系统性较为明显，而也正是语音系统、语法系统的客观存在及其相关研究，才使语言体系观念在语言学界得以认同和确立。那么，词汇作为三要素之一，是否也存在与语言体系相应而与语音、语法系统相当的所谓系统呢？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周祖谟(1959: 10)^①提出的“词汇和语法构造一样,也是成体系的”,但“词汇就是词的总汇”的普遍认识,仍然一如既往地影响和制约着汉语词汇的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们对词汇的一般定义中略知一二。如:

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斯大林 1953: 17)

每种语言所蕴藏的词的总汇叫做“词汇”。(孙常叙 1957: 161)

“词汇”是指语言中所有的词来说的,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语言的词汇。(周祖谟 1959: 9)

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和成语等固定用语的总汇就是该语言的词汇。(叶蜚声、徐通锵 1981: 126)

所谓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张永言 1982: 1)

语汇是某一特定范围内语素、词和固定短语的总汇。(邢福义 1991: 156)

词汇是一个集合体的名称,它指的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的总和。(黄伯荣、廖序东 1991: 325)

以上关于词汇的各个定义,反映了人们对词汇基本性质认识的逐渐深化:词汇不是对所有的语言而言,而只属于“某一种”或“一种”语言;词汇的构成要素不仅仅是“词”,还包括种种“词的等价物”,甚而因“语素”的加入而把“词汇”改称“语汇”。然而,以上诸家在词汇的一般定义中,都无一例外地用“总汇”

① 由于本书引文较多,故采用“(作者)出版年代:页码”、“(作者)刊物出版年份/刊期”或“《书名》,页码”等形式标明引文出处,详细出处参见书末“参考文献”及“引用书目及版本”部分。

“总和”“汇集”等来解释词汇，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认为词汇是词的数量上的汇总，是个体成分的简单相加。

1961年，针对以往“词汇是语言的词的总汇”的一般定义，黄景欣（1961/3）认为，“这个定义把词汇的构成看成是词的单纯的数量上的堆积、总和，这是不正确的，像语言的其他一切构成要素一样，词汇也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要素构成的体系”，并由此给词汇下了不同的定义：“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同时也构想了词汇系统的词汇层。20世纪80年代，武占坤、王勤（1983）又从词汇成分（词素、词、熟语）间的层递联系性、成分总规律的制约性、成分间共时与历时的彼此作用和影响等角度对词汇体系问题作了相当深入而有根据的说明。在60年代，刘叔新（1964/3）基于当时发掘出来的结构组织十分有限，远不能将全部词汇纳入其中，指出就“目前所能看出的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而言，“词汇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含有种种小组织的整体，只不过不足以成为体系”，到了90年代，他（1990：382）又探讨出了一些“真正词汇本身内部的词语结构组织情况”，认为“既然全部词语都被相互的意义结构关联安排在一定的结构组织中，而且各种结构组织既各有不同的特点，各自拥有一定数量，又彼此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而就可以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一个体系”。

众所周知，客观世界是一个由同类的、类属的、集合与部分的、相关的、相反相对的种种组合关系联结起来的大系统，而人类思维体系有着比客观世界更为严密、抽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这样，在认识、反映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人类思

维的工具，其系统性就成为由内容决定了的一种必然性。“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王力 1980：545）诚然，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语音、语法是它的子系统，词汇也不例外，三个子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系统性或隐或显，而人们对系统内部结构的认识相应地或深或浅而已。

词汇是成系统的，各词汇成分不是互不关联的一盘散沙，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着对立、制约等错综复杂的联系，系统中的每一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把相关的词汇成分聚成一个组系，进而形成网络，构成系统。词汇系统论的提出和确立，不只是在理论上深化了对词汇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词汇系统”的观念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使词汇研究由单个的、分散的“原子主义”转为组群的、集中的“系统主义”，从而有利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角度、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词汇现象，揭示表象之下的内在联系上、规律和机制。唯其如此，才能如实把握词汇的本质，正确分析林林总总的词汇现象，最终促进词汇甚至是语言的科学研究。可以说，词汇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系统性，词汇的系统性是一切词汇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内在根源，认识词汇的系统性，对于词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词汇系统的性质内容

经过若干年的摸索，“词汇是一个系统”渐渐为词汇学界所

认同和接受。然而，对于词汇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或者说词汇的系统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语言学界仍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认识、论证词汇系统时不一致的角度和依据，导致了词汇系统的“多样性”。

周祖谟（1959：12）认为，“词汇的系统性就表现在基本词汇与词汇间的内在联系上，不但构词方面有其体系，就是词义方面也有一定的关联。……例如‘胜’，可以构成‘胜利、战胜’一类词，又可以构成‘名胜、形胜’一类词，这两类词的意义是有关联的”。

黄景欣（1961/3）在提出“词汇系统论”的同时，又构想了词汇系统存在着的词汇层，由“词汇是一个体系”的简单概括深入到词汇系统内部层级组织的研究之中。他认为这个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地建立起来的”，最高的一个词汇层“由一系列互相对立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几个最大词类构成”，根据一定的词汇—语法意义标准，这些词类又可分成几个更小的对立的单位，“这样逐层地分析下去，直到不能再分析为几个对立单位的那些词，就是词汇体系的最下的一个词汇层”。

针对黄景欣以“词汇—语法范畴”标准建立起来的词汇体系，刘叔新（1964/3）明确指出：“把支配词汇的语法因素当作词汇本身体系结构的经纬，以为这就解决了确立词汇体系结构的问题，是很值得商榷的”，“为建立一个体系，弄清其结构的层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从语法方面来建立词汇本身组织的层次”。他认为，“词汇如果存在着体系，它也只能建立在词汇本身的组织特点上”，“体系既然以内部构成单位间的对应关系为必要特征，要探明词汇究竟成不成一种体系，就需要弄清词汇内部所有组成单位是否都处于相互对应的结构联系中”。据此，他探讨了

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分割对象关系和（固定）搭配关系等能对词汇构成体系起作用的结构组织，最后得出结论说：“目前所能看出的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事实上只表现在上面分析过的几种词汇单位组上，而它们并不能表明词汇的体系性。因此，不可以认为词汇是一个体系。”90年代，在又发掘出了对比组、特定搭配组、互向依赖组、单向依赖组、挨连组、级次组 and 同素族等结构组织后，他（1990：382）认为，“现代汉语没有一个词语单位处在结构组织之外，即没有一个词语不被一定的意义结构关系所勾连和组织”，“现代汉语词汇的体系性，主要就体现在全部词语按照相互的意义关系而确定地置于十一种互有关联的结构组织之中”。

对上述结构组织形成词汇体系的观点，周国光（1986/1）认为概念作为逻辑思维的形式是有体系性的，而“概念体系必须通过词汇表现出来，词汇也必然反映概念的体系性。词汇中的各种语义关系，无不都是概念体系中各种关系的反映和表现。因此我们说：如果概念体系中存在着‘类别—层级’结构，词汇中也必然存在着‘类别—层级’结构；如果说概念体系具有体系性，词汇也一定具有体系性”。实际上，概念和词语的意义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概念的体系性并不能必然推导出词汇的体系性。随后，陈庆祐、周国光（1987/3）另辟蹊径，从词语所构成的若干分系统——形式系统、意义系统、功能系统和结构系统的角度论证了词汇的系统性。

邢福义（1991：158）在讨论了词汇成分之间纵横交叉的关系后，认为词汇系统具有三种主要性质：1. 体系性：一方面表现为“语汇网络的每一个网结发生变化，就会带来与之有关的网眼的相应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各语汇成分都要受到语汇总体规律的制约”；2. 层级性：“语汇不是处在一个平面上，而是

处在不同的层级上”，大致可以分为语素、词、固定短语三个“互有联系又各有特点”的层级；3. 开放性：词汇成员难以枚举，语素、词能自由生成上一级语言单位，而词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地进行创造、淘汰和吸收。

许威汉（1992：46～62）认为词汇的系统性具体体现在词的内部形式、外部形式和构成形式三方面。词的内部形式即音义的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所形成的种种有机联系，如通过同源词可以发现不少词是相互联系着的；词的外部形式即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所特有的偏旁（义符）中体现出来的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如以部首为义符的同类词就反映了概念意义的聚合系统；词的构成形式即汉语词汇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扩展的趋势，形成词汇系统中词义表达的成片复音化。

徐国庆（1999：5）在全面总结了当代学者从词汇层的角度认识词汇系统性的得失后指出，“所谓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的诸要素所构成的统一的整体。整体性就是系统的最基本的特征。只要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而“词汇系统的整体性是由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有机关联来保证的”，“词汇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才表现为词汇系统的整体性”。在具体分析词汇体系时，他（1999/1）认为：“汉语词汇体系可从三个平面上进行观察：1. 要素平面，即组成词汇体系的构成单位的平面。2. 聚合平面，即词汇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有机关联的平面。3. 层级平面，即各种词汇成分等级秩序中形成层级组织结构的平面。”“要素平面来确定词汇系统的构成：语素、词和固定词组，聚合平面来考察词汇成分之间有机关联的聚合网络，层级平面来研究词汇系统的组织结构。”

综上所述，人们要么根据各个词汇成分不是彼此孤立、游离